

第一章 遗族的半世纪



图1-1 全国阵亡者追悼大会会场

(1994年, 朝日新闻社提供)

第一节 遗族战后的 50 年

战后半世纪以来，所谓阵亡者^①遗族持有的国家观、天皇观、战争观和对外观等是多种多样的。即便在遗族家庭里，妻子、父母和孩子对历史的认识程度也有微妙的差异。

如果用“阵亡者遗族”一词概括所有的遗族，那么，遗族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就显示不出来了。往往一说起阵亡者遗族，人们就立刻联想起每年 8 月 15 日全国阵亡者追悼大会上的悲痛场面，或“财团法人日本遗族会”（以下简称日本遗族会）给人的那种不得不敬而远之的“遗族形象”。

这是许多人对阵亡者遗族形成的印象。那么人们心目中的“遗族形象”是怎样一副形象呢？人们是不是认为所有的遗族都去参拜宗教法人靖国神社，都渴望国家“表彰英灵”或一听别人提起侵略战争就愤怒地说“你是亵渎英灵”呢？

果真是这样吗？如果分析一下每个遗族的具体情况，我们会发现在全国阵亡者追悼大会上看不到的另一副面孔，就会看到一种与日本遗族

^①指战争期间战死和病死的军人和文职人员。

会“遗族形象”不同的遗族姿态。

迄今为止，研究日本对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时，一般很少考虑有关阵亡者遗族的问题，可是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，阵亡者曾经在最前线冲锋陷阵，这是事实。在此，让我们主要探讨一下几位阵亡者遗族的战后生活状况。

1. 难寻的梅里尔岛

从东京 JR 中央线国分寺站到京王线府中站之间的国分寺大街上，大型货车和公共汽车整天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，致使沿街住宅和商店等终日处于振荡和噪音之中。下车后步行约 15 分钟，来到街中心，那里有一家不大的毛线店，店名叫“梅里尔”。

推开店口的玻璃门进去就会看到，左侧货架上是暄腾腾的毛线，右侧货架上是书，有 1500 册。不用说，书也是商品。这家商店有些奇特，毛线和书各占一半，或许毛线偏多一些。

书架上的书有《不许再次发动战争》、《生命的故乡与水稻栽培》、《旧生驹隧道与朝鲜工人》、《南非的人们》等，这些书大多与环境、历史、人权有关，在其他书店很难买到。由此可以看出店主的用心所在。

久保进(54岁 敬称略)几经调动工作后,于1986年开张经营此店。店名“梅里尔”是他父亲战死的地方,即西太平洋贝劳群岛中的一个小岛。现在这个小岛已属于贝劳共和国。

“当时,在高中地图上找不到梅里尔这个地名,更搞不清它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想,如果用它作店名,说不定会得到有关梅里尔的消息。当然,也有为父亲安魂的意思。”

久保说对此没抱多大希望。可是有一天,一位船夫送来了一张标有梅里尔的地图。看了这张地图才知道,原来南边的一个小点点就是梅里尔岛。

久保全然记不起父亲长得什么模样。因为父亲出征时,在家排行第三的他刚刚1岁零9个月。

1933年3月,即“满洲事件”发生两年之后,他父亲达雄大学毕业后,到王子造纸厂工作。1936年,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之前,与母亲结婚,时年26岁。

达雄的入伍通知书迟迟未到,对此,母亲曾抱有一线希望地猜测说:“也许不来了。”不料达雄32岁时即第4个孩子出生的1942年夏天收到了“红纸”(入伍通知书)达雄入伍时,日本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,已开始出现败战的迹象。

达雄属于陆军“第 2929 部队吉田队”最初被派遣到中国北部。在战局吃紧的 1944 年 4 月又调到贝劳群岛的科罗尔岛。后来，又被分散到南边的梅里尔岛。当时是哪年哪月说不清楚。

达雄入伍 3 年后日本战败，但他的下落不明。败战后不久，父亲的战友突然来访，说达雄已经死了，并把一个小木盒交给了母亲。木盒里装的是骨灰。那位战友少言寡语，只告诉说父亲是 1944 年 12 月 30 日病死的。到 1946 年，才正式接到死亡通知书。

上等兵达雄，死亡后晋升为下士。母亲成了阵亡者之妻，久保成了阵亡者遗儿。

“其实父亲是饿死的！”本来就大嗓门的久保加强了语气说，“被分散到梅里尔岛的部队没有给养，士兵们靠吃四脚蛇、蛇、青蛙等充饥，维持生命。有的士兵因适应不了这种生活，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，直到最后死去。达雄就是其中一例。”这席话是父亲的战友讲给母亲的，隔了很长时间以后久保才听说。久保至今仍心存疑虑：木盒里装的到底是不是父亲的骨灰呢？

自达雄入伍后，他和妻子未曾见过一面。除了通过军人信函联系外，见面交谈的事儿连想都不敢想。他们的婚后生活时间仅 5 年零 8 个月。

1994 年 11 月 27 日，久保家族和亲友在新宿区神社举办了“久保达雄 50 周年悼念活动”。这一年是达雄去世 50 周年，悼念活动按神道习惯搞年祭，不搞忌辰。为此，久保用 B4 纸打印了一份“久保达雄生平”，年谱的最后写着：“1944 年 12 月 30 日在作战期间，在梅里尔岛病故。”

久保指着生平上的这行字说：“开始时，这儿我写的是饿死。可是又一想，要是那样写，母亲肯定会说，‘你把饿死二字给我删去’所以后来就改成了在战争期间病故。”

2. 忘却过去的母亲

78 岁的母亲多年来一直擅长俳句。在 50 周年悼念活动时也吟了几句，其中有这样一句：

“英灵和菊花的四十年。”

对于这位母亲来讲，达雄果真是“英灵”吗？另外，还有这样一句：

“今年又将迎来讲述战争的败战日。”

她在句中用的不是“终战”而是“败战”这个词。接着，她对这 50 年（这比她与达雄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10 倍）是这样形容的：

“50 年像走马灯似地转瞬即逝。”

“母亲把父亲和父亲战死的事儿全都丢在了

脑后，她拼死拼活地养大了三个孩子（长子半岁时夭折）。母亲是西服裁缝。我们这些孩子无论是在睡觉时，还是夜里醒来时，还是早晨起床时，总是见她在干活儿，天天如此。孩子们都很担心，妈妈到底什么时候休息呀！”

每天早晨，久保帮助母亲准备早饭，而且经常做些其他家务活儿。他希望母亲轻松愉快地度过晚年，总觉得这样做才是对母亲的孝敬。

中学时代，老师常说，“没有父亲的孩子进不了大企业。”

“从那时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好啊，我是不会输给那些父母双全的家伙们的，走着瞧吧，我要为母亲争口气，拼死地干呀！”

久保说自己曾是一个很为母亲着想的“乖孩子”。他曾在电气通信大学攻读通信经营学，毕业后到大企业电气机器公司就职，这是 1963 年的事。不过，那个时候的久保，已不再是高中以前那个“为父母而存在的乖孩子”了，他又有了另一种“孝敬父母观”。

“因为母亲好像忘却了有关战争的一切，所以孩子们在生活中也就避而不谈有关战争、阵亡者之类的话题。可是到了大学时代，不但谈起遗族这个词，而且还开始思考父亲为什么战死的问题。”

题。”

“有时候，猛然想起小学时的事。记得那时到小朋友家去玩，发现他家有一个自己日常生活中未曾有过的陌生男人。觉得纳闷：他是谁呀？可是小朋友叫他‘爸爸’，‘哦原来这就是爸爸’我顿时恍然大悟，明白了这个爸爸不再是文字上的爸爸，而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爸爸。”

尽管如此，三个孩子真正明白爸爸的含意，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因为久保失去了父亲，所以他总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一种自卑感。

上了大学以后，久保开始认识到，这种自卑感的产生也是战争受害所致，决不允许这种受害再次出现。

3. 儿子的转变

久保在即将就职之前，常常在家里谈起有关“战争”的话题。那个年代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政治就在身边。大概他也是受到了60年代政治气候的影响吧。

那么，当时母亲怎样评价久保呢？事情过了很长时间以后，久保曾问起过母亲。母亲说：“你呀，那时候动不动就说战争、战争的，每次听了以后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难受。”

对于母亲来说，“战争”与夺去丈夫的战争别无两样，作为阵亡者之妻，她是把那一切完全抛开才得以在战后生活下来的。可是她觉得儿子竟然连这些都觉察不出来。

不过，久保已经开始关注母亲连提都不愿提的“战争”问题了。他说：“我不认为只要拼命工作，母亲就能过上幸福日子。要是打起仗来，拼命工作就更无意义了。所以倒不如把精力投入到防止战争再次发生的活动中去，并做出应有的贡献。从根本上讲，只有不发生战争，母亲才能过上幸福日子……我的思想就是这样发生了转变。”

他增强了反战思想。但是，当时他只有受害者意识，根本谈不上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者意识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起初他住在西宫宿舍，到兵库县伊丹市工厂去上班。主要工作是用电脑进行产品质量管理等。他在那儿工作三年期间，每周和朋友们一起学习一次中文。他知道毛泽东也是在那个时期。

“为买不买日文版的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我曾在书店的书架前做了几个月的思想斗争。当时想，看了这些书，人生观肯定会发生变化。于是，最终还是把书买到手看了，自己的思想果然起了变化，理解了实践的重大意义。”他说。

久保参加工作后的第四年，被调到镰仓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活跃起来，一方面积极参加公司内部有关职业病问题的研究活动，另一方面还加入了著名中国文学专家竹内好主办的“中国之会”，并组织了“镰仓中国之会”。他从与竹内有了接触之后，对中国和朝鲜也产生了兴趣。

正在这时，“靖国神社法案”被提交国会。他在镰仓参加了反对这一法案的活动。

久保说：“不过反对靖国神社法案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遗族，只是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对侵略战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
这一时期也是久保感到非常苦恼的时候。因为他调到镰仓以后，工作是从事导弹生产。“我反对战争怎么能从事这样的工作呢？”为此他每天都感到焦躁不安。“直升飞机在工厂上空飞来飞去，地面上一边开着坦克一边开发电子装置。我觉得自己心里十分矛盾，每时每刻都在想，怎么办？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1976年，工龄已有13年的久保辞去了公司的工作。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：如果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，就要丧失人性。此时，久保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父亲也应对侵略战争负责任了。

4. 母亲成为遗族会会员

当时，久保根本不知道，正是这个时候，母亲却加入了日本遗族会下属机构——地方遗族会，成为该会会员。后来，久保问起这件事时，母亲解释说：“我是在附近会员的动员下入会的，听说入会后每年可以乘大轿车去一次把阵亡者供奉为‘祭神’的靖国神社。”

这番话是在 1976 年春天讲的。这一年她正好 60 岁，到了退休年龄（孩子们都上了大学之后她才开始工作）。在退休之前，母亲除了偶尔参加公司组织的慰劳旅游外，从不外出。乘车去靖国神社旅行，成了母亲的小小乐趣。

久保辞去公司工作之后，又到一家地方出版社当编辑。他终于可以毫不顾忌地对母亲提出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了。

“父亲遭人杀害，您为什么还要去靖国神社呢？为什么不批判天皇呢？”久保有时还对母亲这样说：“归根结底，父亲死无代价，也只能这么说，他是死无代价。”母亲听了，立刻陷入沉默，闭口不语了。

久保很自信地说：“母亲的心情特别复杂，她肯定不愿去那样想。”尽管如此，母亲对儿子关于

“久保家族近代史”的研究说明不得不点头认可。

久保的外祖父曾作为大藏省财务官员，参与了“韩国合并”。继朝鲜银行的工作之后，又出任朝鲜殖产银行理事。祖父曾任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（满铁）调查部总务课课长。

由此，久保认识到，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，父母双方家庭都曾参与了侵略战争。而且，父亲达雄参加的战争是侵略他国，使他国蒙受灾难的战争。他说：“母亲已是那样的悲伤，何况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亚洲人民呢？更是无比的痛苦。”

母亲每年都缴纳遗族会会费（每年 1000 日元）去一、二次靖国神社。但是她不认为把丈夫作为祭神供在靖国神社是件好事、幸事。母亲根本不了解日本遗族会反复强调的“日本不是侵略国家”等实际情况。对于母亲来说，遗族会就好像是一个组织大家去靖国神社旅行的团体一样。通过观察母亲，久保认为，在遗族会问题上，随母亲的便，怎么做都好。不过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阵亡者遗儿久保的心情与母亲的心情发生着共鸣，这也是事实。

“我一想起父亲，总觉得去当兵打仗，并非出自本人意愿。他本希望度过平凡的人生，但国家

政策却驱使他参加战争，不幸死亡。从这种角度上讲，他是国家的受害者。所以，我总是抱有要讨还父亲的思想。这种思想至死都不会改变。被称为遗儿的人们可能都如此。”

久保辞去公司工作，又换了四份工作后，开始设店经营毛线，他把该店取名为“梅里尔”肯定与他的现实思想有关。

由于久保有上述经历，每年夏天，他都积极参加当地举办的“和平祭”活动。久保说他把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整理成了一篇短文，刊登在非定期刊物《梅里尔通信》（1994年9月11日）上，并让本书作者看了他的文章。可以说，这篇文章代表了阵亡者遗儿的心声。其主要内容如下：

“我们〔日本人——作者注〕应当正确理解当前正在被追究的战争责任问题。我们不能只是用经济补偿搪塞了事，而是要向国内外，特别是要向亚洲人民讲清楚，日本不会再重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天皇军队。然而，天皇制和军队（自卫队）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，使得战争责任暧昧不清了。”

几年前，母亲曾在地方遗族会集会上谈论起天皇战争责任问题。“于是，会场的气氛立刻显得尴尬起来。”母亲笑着给儿子描述了当时的情景。

5. 丈夫战死在“阿波丸”

1993年8月25日朝日新闻“声”专栏刊登了一位77岁妇女的文章，标题是“战争牺牲者之死的意义”。文章指出：“太平洋战争末期，与病魔抗争的父亲因不能静下来疗养，最后去世了。接着是母亲病故。两个月后，接到丈夫战死通知，又过了两个月，日本败战。”

用今天的目光看，在那个时代，不幸比比皆是。但具体对个人来讲，至今还是难以接受。笔者见过撰稿人石崎菊^①。文章中说是战死，本以为她丈夫是军人。

“不，他是文职人员。”菊身子纤弱，好像风一刮就要飘起来甚至折断似的，她用温和而认真的口气开始叙述。

1943年12月，正在台湾台北帝国大学地质研究室做助教的丈夫和彦，应征到陆军省燃料厂做文职工作，受命调查波罗洲（亚洲）的石油资源。这是婚后第3年的事。

和彦去波罗洲之前，先在东京集训了3个月。他抽时间买上自己研究领域的专业书和所喜好的

^①菊为音译。

有关音乐方面的书后，寄给留在台北的菊。过了一年半的 1945 年，日本败战大局已定。和彦结束了石油调查任务，于 3 月 28 日从新加坡乘商船“阿波丸”踏上归途。

“阿波丸”本是给在东南亚的盟国俘虏或被拘留的人员运送慰问品的，后来改为运送该地区的日本非战斗人员。据说该船是安全船，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也有安全保障，不需要临时检查，也不作为攻打目标。船体上带有绿底白十字特别标志，夜间都清晰可见。

菊从提前回到台北的熟人那里听说丈夫已经上了“阿波丸”，就放下心来了。可是，一周过去了，没有任何音讯。正在着急时，收音机里传来了“阿波丸”遇难的消息。据说是在台湾海峡被美国潜水艇击沉了。可是没有广播具体细节。

6 月的一天，菊突然收到陆军省通知，通知里写着经查实石崎和彦乘“阿波丸”遇难。

以上是通知的全部内容。和彦时年 28 岁菊和他同岁。

“阿波丸”上共有 2045 人，仅 1 人幸存。美国击沉了受国际法保护的“阿波丸”，责任极大。当初，美国政府也明白这一点。可是，美国占领日本以后，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说：“战胜国没有

赔偿义务。”在他的压力下，1949年4月，日本政府宣布放弃所有赔偿请求权。

1946年3月，即败战7个月以后，菊回国。为了生存，她先在东京大学研究室当了两年打字员。后来，她身体不太好，住在长崎的和彦的妹妹惦记她，把她接到长崎居住。

到长崎以后，菊找到了一份新工作——当教师。她在台北拿到的教员许可证派上了用场。

她没有再婚。这是因为和彦从东京寄回的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：若是万一，希望你尽量留在石崎家。这是和彦的心里话，因为他考虑自己是石崎家唯一的儿子。像菊这样被遗弃的女性，当时被称为“战争未亡人”。

为求生存曾经不畏艰辛的菊，后来还想继续深造，于是就到横滨的短期大学学习英国文学。1953年，36岁的她大学毕业，并到横滨市立盲人学校当英语教师。

“不过，在这一时期，尽管自己的人生以及周围的一切都与战争密切相关，但我几乎没有考虑过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，”菊说。

菊没有参加相当于日本遗族会支部的地方遗族会组织，她也从未把这类事放在心上。

6. 基督徒

可是自反对“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”运动以后，菊的视野开始逐步向社会转移。

“另外，还有八海事件。该事件是警察逼供造成的冤案。因为石崎的亲戚与此有关，所以我很关心这件事。以前，我从未对国家所作所为产生过怀疑，这件事使我深感震惊。”菊至今仍心有余悸。

把菊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的事件连续发生。接着是1967年创建“建国纪念日”。“我预感到了军国主义复活的紧张气氛”。

1969年6月，要求国家守护靖国神社的“靖国神社法案”被提了出来。在战争期间曾受到残酷镇压的宗教界，特别是基督徒对完全否定政教分离原则的该法案做出强烈反应。菊自战前就是基督徒。她所属的教会在该法案提出之前就组织了关于靖国问题学习班，菊也参加了学习。这次学习班，对菊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。通过学习，她明白了靖国神社曾在动员人们上战场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。而日本遗族会坚决要求国家守护靖国神社。正好在这一时期，基督徒遗族会成立，她立刻入会了，通过在那里与会友们的交